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求索文明源

严文明自选集

严文明◎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QIUSUO WENMING YUAN



求索文明源

尹文彬著
尹文彬
编 1999.10.10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求索文明源

QIUSUO WENMING YUAN

严文明自选集



严文明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索文明源:严文明自选集/严文明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56-3571-7

I. ①求… II. ①严… III. ①考古—中国—文集 IV. ①K8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8329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QIUSUO WENMING YUAN

求索文明源

严文明自选集

严文明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钱 浩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印 张 32 插页 2
字 数 379 千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满运来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委会副主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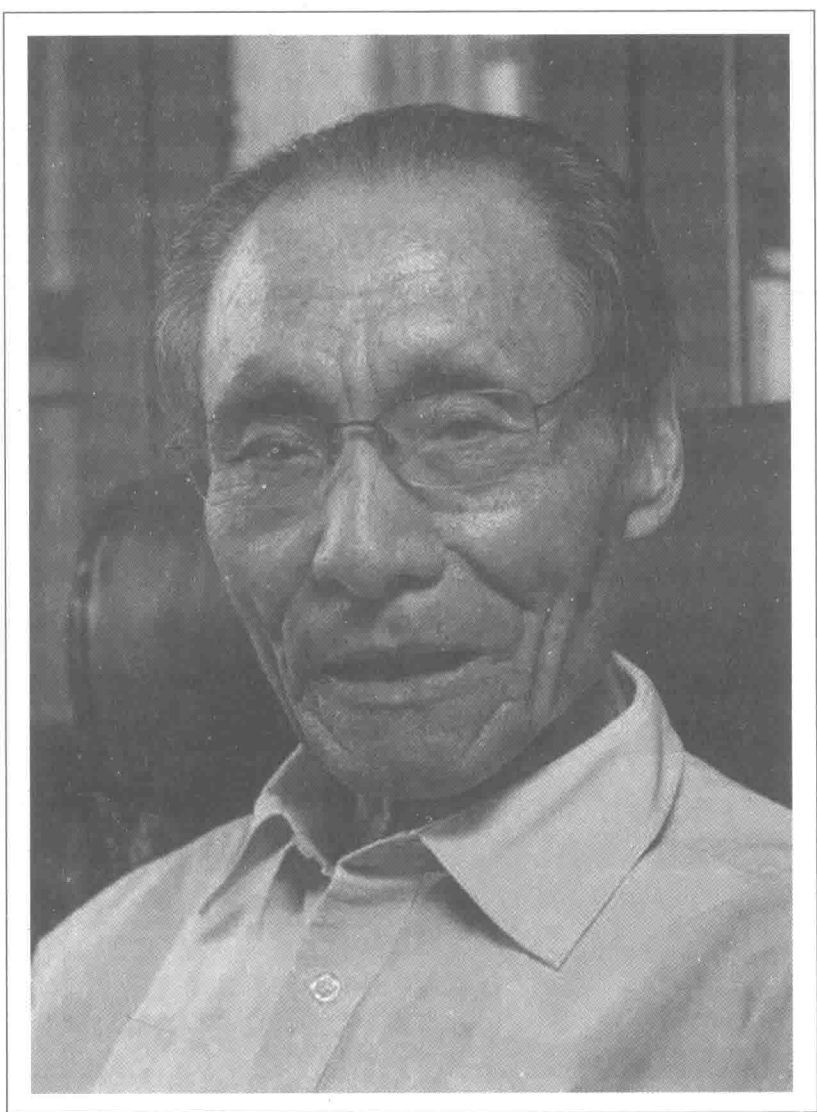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9年11月



严文明先生

我与考古学

有些年轻朋友问我是怎样选择自己的学术道路的，是不是一开始就喜欢考古学？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正式学考古以前，还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考古学，因此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更不可能主动地选择考古学作为自己一生从事的主要事业。但是一旦进入这个领域，我就情不自禁全身心地投入，甚至把考古学作为我的精神寄托。这话得从头说起。

我学考古学完全出于偶然。1953年我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那不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一志愿是理论物理，没有考上使我非常失望。因为我在中学的各门课程中，成绩最差的就是历史课。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学。到二年级时要分专门化，我犹豫不定，不知道选什么好。曾经一度想选中国近现代史，那样离现实近一点，不至于陷入老远的古代不食人间烟火。没有想到当时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找到我，说考古也要懂科学技术，跟理科还是有些关系，动员我学考古，我就糊里糊涂地选了考古专门化，后来改称为考古专业。所幸我小时候在先父的安排下并不很情愿地读过一些古书，包括《四书》和《诗经》《尚书》《左传》的部分内容，还选读过不少古文和古诗词，多少打下了一点旧学的基础，对以后学考古还有些用处。后来在学习过

程中受到一些老先生的鼓励，特别是当时任系主任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关怀和鼓励，使我坚定了学习考古学的决心。我在纪念翦老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过相关的情况。

课堂学习使我了解到考古学的一般情况，但并没有入门。初步入门应该是从田野考古实习开始的。我参加过两次实习，一次是1956年由裴文中和吕遵谔先生率领到内蒙古赤峰地区进行红山文化和细石器遗存的调查和试掘，一次是1957年由宿白和邹衡先生率领到河北邯郸地区进行新石器时代和商周考古遗存的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编写报告。两次实习使我懂得了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操作，而且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差错，否则就会影响结论的准确性。而每一次正确的考古工作总会有新的发现，总会提出或解决某些学术问题，这使我对考古学逐渐发生了兴趣。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让我教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这倒符合我自己的志愿。因为我认为新石器时代考古最能够体现考古学的特点，不像旧石器时代考古那样离不开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也不像历史时期的考古学那样离不开古文献，而可能研究的资料又远比旧石器时代丰富，可以涉及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再说从事教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必须对所教的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包括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而学生提出的问题又往往对我有所启发，这就叫作教学相长。

1958年有个全国性的“大跃进”，在大学则要求在学术领域进行所谓的“大破大立”。作为考古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就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考古学，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上面的大力号召一下子把青年人的热情鼓动起来。我自认不会也不情愿写批判文章，就跟57级学生一起编写新石器时代考古讲义。即使这样我也觉得让没有学过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生来写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讲义很不合适，但又没有办法。当时在“大跃进”的那种发神经病似的空气中，历史系57级中国史专业的学生要用40天写出一部红彤彤的《中国通史》，世界史专业的学生也要在40天内写出一部红彤彤的《世界通史》。他们都只是二年级的学生，决心要用这样的成绩向党的生日献礼。考古专业还让年轻教师参加已经是显得很保守了。当时在考古专业的任务是要写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考古学》，除新石器时代考古之外，其他各时段也是采取师生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写完之后于1960年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作为内部讲义使用。此后我每年都要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觉得原有的讲义基础太差，无法使用。要达到大学教材应有的水平，就只好重写。我在自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下决心花大力气来做这件工作。首先是要阅读资料，全面了解前人的工作和研究成果，把从安特生起几乎所有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学者的著作都仔细阅读过。为了作些比较，我还阅读了庞培里在中亚土库曼所作的安诺遗址考古发掘报告，赫洛宾在安诺以东格奥克斯尔绿洲的考古报告，以及帕谢克关于乌克兰特里波列诸遗址的分期研究，苏联卡施娜的《仰韶文化研究》等，有些还做了详细的笔记。我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安阳队、洛阳队、内蒙古队、山东队、山西队、西安研究室和长江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还到各主要省份的文物工作队和博物馆参观学习，做了大量的笔记。同时在写作中就有关问题多次向翦伯赞、裴文中、夏鼐、苏秉琦等老先生请教。这样在1962年就完成了初稿，以后边教学边修改，到1964年5月出了红皮铅印本。全书约24万字，另编有插图一本。此后多年没有修改，只在讲课时加印一点补充材料。这份讲义也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成体系的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著，尽管还不很完善和成熟。在当时提倡所谓敢想敢干，大事批判所

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际是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气氛下，我的这种做法和态度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回过头来看，我没有听从召唤跟着大起大哄，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对的，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记得我把红皮铅印本送请系主任翦伯赞先生指教时，翦老极力主张正式出版。可是教研室主任苏秉琦说现在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有些看法就可能要改变，不要着急嘛，放一放再说吧。这一放就没有日子了。

写一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教材，首先是应教学的需要。因为中国当时不但没有任何考古学教材，甚至也没有相关的专门性著作。对我来说则是想通过编写讲义全面地了解这个时期考古的成果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体系上把握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情况。不足之处是不容易深入，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提升也颇有限。因此我先后请教过翦老和裴老，他们除了跟我讲了一些大道理和鼓励的话以外，还建议我从关键性的具体问题着手进行研究，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我考虑到仰韶文化在整个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处在关键的地位，而且发现得最早，资料积累最多，有关年代和社会性质的争论十分热烈而各人所据资料并没有经过仔细的核对和科学的分析，因此我就从仰韶文化的研究开始。

当时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知道它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的学者认为属中期）、以彩陶为特征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年代可能比龙山文化早。本身还可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社会性质可能是母系氏族公社（也有人认为是父系的）。1962年师兄杨建芳发表《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对仰韶文化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1965年苏秉琦先生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更对仰韶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这两篇文章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不过我觉得当时许多人研究仰韶文化时对基础资料缺乏认真的分析。基础资料

不准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牢靠。例如大家讨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关系，有的说半坡类型早，有的说庙底沟类型早，有的说二者同时，并行发展。但究竟什么是半坡类型，什么是庙底沟类型，却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相互的地层关系也没有认真分析。这样的讨论自然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当时我想，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都应该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这些不同的表现除了内部的原因以外还可能还有外因，特别是周邻文化的影响。只有在这些问题都基本弄清楚以后，该文化的生产和经济发展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以及精神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的研究才有必要的基础。我就是本着这样的理念来从事仰韶文化研究的。但是要了解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首先就要做好文化本身的分期工作。而分期研究不能从文化类型出发，也不能笼统地从遗址与遗址的比较出发，而应该首先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分析，把每个遗址本身的分期弄清楚。然后将邻近区域相关遗址的分期进行比较，明确区域内的文化分期。再将各个区域的分期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整个文化的分期。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逐级概括的认识过程。考虑到仰韶文化分布的渭河流域、汾河流域和洛河流域等自然分界清楚，文化面貌也略有不同，所以首先按照这种分区来选择典型遗址，按地层单位和器物类型重新进行分期研究（这是万不得已的。如果考古报告写得好，这一步原是可以省略的）。1966年以前，我先后分析了河南洛阳王湾、澠池仰韶村、陕县三里桥和庙底沟、山西夏县西阴村和陕西西安半坡等遗址的资料，后来又着重分析了宝鸡北首岭的资料，并且以这些遗址的分期为基础，进一步分小区进行分期，最后进行整个文化的分期研究，并撰写《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的论文。可是论文还没有写好，一场“文革”无情地把我

的计划打破了。不过“文革”后的研究基本上还是按原计划进行的。关于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或社会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之交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当时一些人往往从原始社会晚期应该分为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两大阶段的概念出发，认定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正好与这两大阶段相适应。有些学者为了论证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社会，主要抽取半坡类型几个墓地中个别不甚准确的材料进行解释。我那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要全面准确地掌握材料，而且单靠墓葬材料也觉得不够充分，所以一直没有动手。后来由于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的全面揭露，我才觉得有了初步的基础来探讨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关于姜寨早期村落的研究就成为我从事聚落考古研究的开始。此后关于仰韶文化又写了几篇文章，直到1989年才把有关论文结集出版了《仰韶文化研究》一书。其中关于聚落形态和埋葬制度的研究摆脱了传统的所谓母系父系说。因为社会的发展不是按家系的变化而是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划分阶段的，其中尤以所有制的变化最为重要。我着重分析了姜寨等半坡类型的聚落和大量墓葬资料，发现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应该是以氏族公社为基础，同时有部分家族和胞族的财产，至少是三级所有制。此种情况到庙底沟期开始发生变化，到仰韶晚期变化更加明显。但当时因后两部分的材料尚不充分而没有展开讨论。

我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中摸索到了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方法或必须遵循的程序和路线。有了这个研究，对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就方便多了。苏秉琦先生在介绍《仰韶文化研究》一书时，很欣赏我的研究方法，说是我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钥匙。在往后的岁月里，我确实用这把钥匙对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当然，这个体系

也是吸收了许多同行的研究成果而建立起来的，还不大完善，需要继续做很多的努力。

与仰韶文化研究相关的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早在1923至1924年，安特生为了寻找仰韶文化彩陶的来源，到甘肃和青海东北部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1925年发表《甘肃考古记》，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应该是从中亚通过甘肃走廊传播过来的。这就是后来遭到广泛质疑的所谓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还以为马家窑式和半山式陶器同属仰韶文化期而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猜想前者是日常生活用器，而后者只是用于为死人随葬的，因而把上面特有的锯齿纹称为丧纹。我虽然不相信他的说法，但需要找到确实的证据。

1963年秋，我带领几名学生到甘肃实习，重点整理了雁儿湾等几处遗址的材料，进而全面了解了甘肃新石器时代各期文化的谱系和分布状况。发现彩陶最早是从陕西的老官台文化逐步向西发展，经过仰韶文化的半坡期和庙底沟期进入甘肃，继而经过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四坝直到河西走廊的西端，演变和传播的路线非常清楚，西来说应该改为东来说或西去说了。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甘肃彩陶的源流》，把这个长期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说清楚了。那次实习的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青岗岔半山期房址的发现。这个遗址在兰州市以南约15公里的小山顶上。文化层不明显，陶片很少。我在一个地块的坡面上发现有一些红烧土，还有一块半山式陶片，决定进行发掘。结果发掘出一座经火烧毁的半地穴式的房址，里面有12件半山式陶器，包括三件有锯齿纹的彩陶瓮。有的陶瓮里还残留有少量被烧成黑炭的黍粒。这些半山式陶器分明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绝不是为死人随葬的。安特生的这一猜想虽然在当时还有人相信，事实证明也是不正确的。

安特生毕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他应中国政府的聘请做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大部分时间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对中国地质学和矿业的建设有很大贡献。他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对北京猿人的发现和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都有重要的贡献。当然也有失误，这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也许是难以避免的。我在纠正他的错误的同时，并没有像当时一些人那样采取批判和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长江流域考古和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二是山东考古和东夷文化的探索。

我国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开展较晚，那里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如何，有什么特点，在全国史前和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1974 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应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陈准先生的邀请，参加湖北省宜都红花套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我负责业务指导。同时在那里进行田野考古实习的还有厦门大学和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师生。红花套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属大溪文化，也有少量屈家岭文化的遗存和东周时期的墓葬。我们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叠压大溪文化的地层关系，第一次解决了在当时尚不明确的两个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更重要的是在大溪文化时被烧毁的房屋遗迹中，发现了大量掺和在泥土中的稻壳痕迹。当时还只知道屈家岭文化有粳型栽培稻，红花套的发现把栽培稻的历史提前了好几百年，促使我认真考虑长江流域是不是稻作农业起源地的的问题。1976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因为有海泥等特殊的保存条件，发现有大量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和稻谷遗存，年代达公元前 5000—4500 年左右，是当时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在此前后史前稻作遗存还有不少发现。我把这些材料梳理一下，同时与国外稻作遗存发现的情况进

行比较，觉得以往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些提法值得重新思考。于是在《农业考古》1982年连续两期发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提出一个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新见解，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此后稻作遗存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其中绝大部分在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是从1988年开始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垵等多处属彭头山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大量稻谷遗存，经鉴定都是偏粳型的栽培稻，年代却早到公元前7000—5500年，比河姆渡早了2000年！在此之前河南舞阳贾湖的发掘，也发现了粳型的栽培稻遗存，年代和彭头山文化相当。因此我在1989年出版的《农业考古》上发表《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明确提出长江流域起源说，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意见。为了论证何以长江流域会成为稻作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中心，我又提出了一个稻作农业起源的边缘理论，简称边缘起源论。因为作为栽培稻祖本和普通野生稻自然分布的北部边界大致在一月平均 4°C 的分界线以南，这条线也大致与长江相伴。可见长江流域基本上就在普通野生稻分布的北部边缘。既然在边缘地带，自然生长的数量应该比中心地区少，不大容易采集到足够的数量。稻谷的栽培与其他谷类作物的种植一样，都是为了缓解食物匮乏的压力而发生的。长江流域有比较发达的史前文化，意味着有较多的人口；又有较长的冬季，天然食物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稻谷是一种可以储藏的食物，在采集食物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随时作为补充。长江流域以南，包括华南和东南亚等地野生稻虽然很多，其他可利用的食物更多。何况野生稻的采集和加工都比较困难，通常情况下没有必要去采集来作为食物，更没有必要去进行人工栽培。这就是为什么长江流域反而成为稻作农业起源地和发展中心的缘故。

我对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我曾先后访问日本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是讨论稻作农业起源和传播路线的问题。

1993—1995年，美国著名农业考古学家马尼士曾经同我合组中美农业考古队，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发现了一万多年以前可能是栽培稻的植硅石遗存和世界最早的陶器。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农业考古学家巴尔·约瑟夫和我与湖南省考古所的袁家荣所长合作发掘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再次发现一万年以前的栽培稻谷粒，进一步说明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确实是在长江流域。

关于东夷文化的探索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我在1977年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即明确提出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乃是史前夷人的文化。我从1979年到1988年主持胶东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重点项目，目的就是在建立胶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谱系的基础上，探索东夷文化的形成、发展到逐渐与华夏文化相融合的历史过程。我们先后发掘了福山邱家庄、牟平照各庄、烟台芝水、栖霞杨家圈、诸城前寨、乳山南黄庄、长岛北庄和珍珠门等数十处遗址，同时还在烟台地区和潍坊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调查。由于照各庄的发掘，我们认识了一个与夏代基本同时的夷人的文化，并命名为岳石文化。烟台芝水二期是相当于商代的东夷文化，长岛珍珠门文化是商周之际的东夷文化，而乳山南黄庄则是春秋时期的东夷文化，那时的东夷已经被排挤到半岛东端靠海的山上去了。我在《胶东半岛考古记》和《东夷文化的探索》两篇文章中讲到了整个考古研究的过程和取得的重要成果。

我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前面各项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转入文明起源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和《中华文明的始原》两本文集。我特别注意通过聚落形态演变的研究来探讨文明起源。1987年在德国美因兹国际史前与原史学联盟第11届年会上发表的《中